

可曾记得，韶颜稚齿，第一次叩你心扉的是哪一本书？青葱岁月，让你瞥见纱帘后复杂而又华丽世界的，又是哪一本？

今天，让我们听沙林讲他的早期阅读史，是为“我的启蒙书”栏目开篇。

春潮

——我的早期阅读史

沙林

花之露

柔软的力量

我的启蒙书

本版刊头设计 常云龙

我这一生最早开读的书，恐怕是“文革”前人民出版社的《论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斜插在父亲的书架上，每天早上醒来都能看到它。我很好奇，还有这么奇怪的名字。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读这样的书，可想而知会有什么奇特的效果了。在半懂不懂中，我知道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公然支持社会主义的敌人铁托，也知道了世界共产党内部不总像太阳下的鲜花那样柔软慈笑，有覬覦，有分裂。一个敌人，那么坏，我们还叫他同志，世界的关系怎么那么复杂？

后来跟“苏修”公然决裂，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更残酷的事实。之前苏联是跟理想连在一起的，跟理想决裂，总让人心里不是滋味。苏联的人文环境中还有人的理想、爱情和古典的优美，与这样的国家决裂，我们会走向何方？

“文革”中最早解冻的三联书店，出版过一本海外华人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是那个时代少有的可读性较强的读物。它以亲历的形式描述了已经与大陆隔绝了10年的苏联“真相”——只能吃黑面包、副食供应紧张、对中国人不友好等，后来在中国广传的“苏修”信息都源自那本书。30多年过去了，仍有几个情节记忆犹新，书中写道，一个亚非国家的留学生一天晚上走过莫斯科一个偏僻街道，被几个苏联流氓围殴致死，我当时很惊讶，青少年能打死一个人？太猛悍了！当然现在，早已经不新鲜了。还有一个场面：在滑冰场，那些高大壮实的苏联人故意撞他们几个相对矮小的中国人……看着现在满街油光胖大的国人，再看到普京一样精瘦的俄罗斯人，总不由想起这个场景。21世纪，我们的营养多足啊！现在的俄罗斯人恐怕不敢贸然冲撞了。

《金陵春梦》给我的感觉不太好。这套书“文革”前就在干部中内部发行，是那时能在大陆出版的少数几种香港作品。它嘻笑怒骂，皆成文章，文字有一种装腔作势的“奉旨而骂”，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大大流氓，大色鬼，一个梅毒患者，把宋美龄写成了一个招蜂引蝶、打情骂俏的贱娘们……后来了解了部分蒋家史实，才发觉这本书捏造的用心。

以上这样的政治类书，浇灌了我大脑中关于文史的那部分细胞，是我最早的启蒙之一。所以说反“文革”、反极左的人，也都是“文革”“毒液”泡大的、恶之花露灌出来的人，谁也跑不了。

心境

我早读的另一类书，我觉得弥补了我们社会当时很缺的一种东西，恰恰与前面极左类读物在我大脑中形成某种平衡，使我没有形成一种极端人格。先说巴尔扎克的书吧，它们除了故事就是故事，人物都有点漫画色彩，没有太多我喜欢的那种人类情思。接着我读到了狄更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雾都孤儿》对一个“文革”混乱岁月中，家父被斗、备感孤独的女孩来说，安慰的力量是很大的。它的文字是那么透明和幽默，主要人物，男孩们，都是苦难中留存知性，孩子气中蕴含正直……用不着说教，这种形象自然而然就吸引一个异族的男孩去自我挖掘性灵中善的一面。这对一个男孩的成长以至塑造一个好人性的性格用处太大了！可惜现在的父母不知，现在的孩子不读！

狄更斯的另一套书《大卫·科波菲尔》是在周总理去世的那年早春读到的。与这本书最相伴的记忆是夜，我最好的伙伴当兵去了，而我因为家庭出身问题独留知青的泥屋。周围的氛围是压抑的，周总理的去世给爱思考的中国人的打击是巨大的。春雪，静夜，乡村，狗吠，西书，还有什么比沉浸在19世纪的英国石板路上和铺满鲜花的庄园里更能忘记现实的痛苦呢？

再后来就接触到了雨果的书了。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都受到了雨果的影响。我的职业一度是采访作家，所有这些被采访的人说到雨果对他们的影响时都肃然起敬。无论如何，《悲惨世界》中的老人冉阿让，是中国文人的的一面镜子，我们至今没有做到这样的爱，我们甚至都不敢塑造出一个这样慈爱无边的文学形象。

《九三年》对中国文人的冲击也是“毁灭性”的。阶级斗争我们熟悉，但法国的阶级斗争中的人性，那种为了更多人的性命而主动牺牲自己去“投降”别人的行为，我们是想不出来的。“人性的丰碑”、“我们心中的纪念碑”，这是那一代中国人以雨果之名偷偷在心里竖立的。

■书林听风

非虚构写作：“真实”之魅、惑

张稚丹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曾撰文说：就我近些年的阅读经验来说，印象深刻的，多是纪实性的作品。如杨宪益的《漏船载酒忆当年》、杨思惠的《夹边沟纪事》、喻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齐邦媛的《巨流河》等。现在的小说大都写得虚假、太琐碎、太无趣。阅读成了痛苦的折磨，而不再是快乐的精神享受。

2010年10月，《人民文学》前主编李敬泽呼吁作家“走向吾土吾民”，率编辑部擎起“非虚构写作”的大旗。之后，发表在《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中梁鸿的《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分别由出版社出版；更多的文学刊物加入这一阵营，非虚构作品大量涌现，并在畅销书榜占据一席之地：高尔泰的《寻找家园》、贾平凹的《定西笔记》、王小妮的《上课记》……

两年过去，我们对非虚构写作是否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非虚构写作是否历史必然？它是文学渡过变革激流之舟，还是新的文学可能性？

什么是非虚构写作

昔日洗衣的清澈池塘，如今肮脏发臭；新房越来越多，人却越来越少，还多是衰弱的老人；梁庄小学沦为猪圈；82岁的刘老太被奸杀，凶手竟是高中生——他父母在外打工，奶奶去世……

已“被城市化”的梁鸿，回乡考察中多次想逃离，吃菜时想起表姐在肮脏的厕所里洗菜，简直难以下

咽。坚持之下有了被称作“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调查”、“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实录”的《中国在梁庄》。

“消失一个月，拿老命开个玩笑。若回得来，还你一个好消息，若回不来，舍我一副臭皮囊。”2009年12月，慕容雪村在微信上留下两句话后，去江西上饶一个传销团伙卧底23天，盖黑心棉被，每天的菜钱只有三毛五，每顿饭的米不能超过一把，写成纪实文学《中国，少了一味药》。

非虚构写作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主体，强调作者身份的个人性、写作的亲历性、文本的揭秘性和叙述的故事性，南京师大教授王晖将它概括为“关注现实、文体宽阔、呈现生活原生态”。

中国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沃土

非虚构写作不从今天始，不由中国创。美国学者约翰·霍洛韦尔认为，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剧变导致纪实文学的出现，“一切事情好像都在以比过去高十倍的速度变化着，艺术家缺少能力去记录和反映快速变化着的社会……这一时期里的日常事件的动人性已走到小说家想象力的前面了。”人们强烈想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于有资料、可靠的、带分析性的东西格外有兴趣。

中国目前也进入社会转型期，频繁变动的世界光怪陆离，无数的信息伴随着生存压力像一场漫天迷雾，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真实的世界以便锚定自我。当下最成功的非虚构作品几乎无一不以乡土中国为基点，就证明了这一点。

苏俄文学，另一条巨大的情感之河。我的整个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持续不断地接受着它的冲刷和洗礼。其中最美的风景，我想，大多数中国人都会说是屠格涅夫，就像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一样，总有一丝契合国人之心。屠氏小说当年翻译成中文的，我费尽周折几乎全都找齐了，并且如虎扑食一样冲过去读。我专说《春潮》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涉及生命无常、命运难测、爱情甜蜜但青春不再的书，给我的冲击非常之大，有很长时间茶饭不香——这让我想起20多年后一次文学会，诗人贺敬之在私下里说下的，那些书（“资产阶级人文主义”作品）对人的诱惑是巨大的，在延安时曾经看过一本，3天拔不出来，马上意识到这样不行……

《春潮》，是年轻人的春潮，我曾经甘愿沉浸其中拔不出来。三个男女青年，暑假在俄罗斯乡下的贵族庄园相遇，接着是长谈、友谊、爱情的默契和痛苦，最后是分离。多少年后，男主人公看到夹在书中的一封信，又想起了这段夏日的邂逅。美丽的女主人公这时已远去美国，不知所踪。他们已经都老了，今生难以再相见……这本书是屠氏作品中最不具有革命意义的，因而不为人知，但对于我，可以肯定地说，具有致命的塑造意义。

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也是一本较边缘的感情书籍，比更有名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更让我失魂。我的阅读经历又转到了英国——那时我们的阅读是华洋相伴，地不分中西，时不分古今的，忽而《烈火金刚》、《平妖传》，忽而《贵族之家》、《红与黑》，主要看抓到什么了，或者是看谁能从封闭的图书馆弄到什么了。

《苹果树》是一本很薄的书。我觉得属于华氏的感情一现或灵机一动的作品，因为与其大多数作品风格是不一样的。一个英格兰城市公子哥假期到苏格兰一游，邂逅一个朴实的乡间姑娘。就在短短的几天里，他们相爱了，在苏格兰的乡下，在苹果树林中，他们山盟海誓，青年说要娶“小芳”，不要仕途经济了，两人就在这世外桃源终此一生。但青年必须回去处理善后事，只需几天时间，两人泪眼相别。离开后的情景，我们可以想象了，青年马上遇到了一个有钱的城市女孩，于是把苹果林中的一切都忘了。人事沉浮，他曾经富有，又历情变。很多年很多年以后，他游历苏格兰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这是一片过去经历过的苹果树林，兀地想起那位姑娘，于是到处打听。知情人指着苹果树下一个坟墓说，他走后，她日夜思念，最终抑郁而死……青年（现在是在中老年）感觉如雷击顶——最难受的莫过于此，想爱而不成，想弥补已隔世！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世界上最不能做的事是辜负一颗朴实的心（画家陈丹青说20多年前读此书时在火车上蒙着被子大哭）。

这一类书，塑造了我人性中很基本的一面。其实当时中国人偷偷地或半公开地阅读，是很普遍的事，铺就了中国人人性中的一层曼丽的轻纱。虽然柔软，虽然总伴有泪水，但该爆发的时候就爆发，柔软瞬间就变成力量，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从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们个人的阅读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肖复兴的书房

郝青文/图

2012年12月27日上午，北京东南三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肖复兴平静的写作时间被这次来访“打扰”了。他穿红色毛衣，戴一副细框眼镜，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爽朗绵密，书卷气里透着家常。

“一般情况下，我上午写东西，下午读书。晚上不能看书，看了睡不着的。”倒完茶，他坐在窗下的椅子上，我们有问有答，书房里显得轻松、平和。

“我第一次自己买书是上个世纪50年代，花一角七分钱，在家对面邮局里买了一本《少年文艺》。那里面有美国作家马尔兹的一篇小說：《马戏团来到了镇上》。这是我读的第一篇小说，在我心中引起的一种夹杂着美好与痛楚的忧郁的感觉，是它带着我进入了文学的领地。”肖复兴说，蓦然进入内心的书和不期而遇的书，应该都有缘分。但读书还是应该有选择。“我的建议是，不读太新的书，不读太老的书，不读礼品书。从前我们读书是困难的，想找一本书很难。现在书的选择太多了，又形成了另一种困惑。”标准有两个：一是真正有意义的，二是自己喜欢的。

肖复兴是现代中国文坛著作颇丰的中坚作家。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甚至剧本，很难用简洁准确的文

字概括他的创作和涉猎。对自己，他在自己的作品集曾有期冀：“要有风格的作家，不能当起哄哄热热闹闹的作家，不充当摇旗呐喊的小卒角色。”

在他看来，读书是一种朴素的生存方式，而不是一杯咖啡的时髦点缀。他喜欢一副明永乐年间的抱柱联——“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说的虽是医德，也可作读书的座右铭。读书是一种修合，不为别人而读，更不为功名利禄。读书人的德性，心知书知，天知地知。

链接 肖复兴，河北沧县人，著名作家。1947年出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历任中央戏剧学院教师、《新体育》杂志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等职。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我们曾经相爱》、《早恋》、《青春梦幻曲》，中短篇小说集《四月的归来》、《北大荒奇遇》，报告文学集《国际大师和他的妻子》、《多梦时节——肖复兴报告文学集》等。



《台湾村纪事》诉两岸同根

都知道台湾有个“陕西村”，有谁知道，河南邓州还有个“台湾村”？1668年，有位叫黄廷的将军，因不满郑成功去世后郑氏家族的内讧，带领10万大军回归大陆，清廷命黄将军到古城邓州南下屯田。他的亲兵营中有群来自台湾阿里山的高山族人，就此定居、繁衍，转眼已过去300多年。从1982年这些高山族人的后裔被发现，30年来，台湾村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走过一段难忘岁月。华文出版社策划推出了《台湾村纪事》，以文学的方式为这个神秘村庄做了一份编年史，确认了台湾和大陆血脉相连的关系。海外华人也可以借助这个小小的切口，清晰看到中国农村30年来的变迁故事。（小章）



年轻的美国人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1996年8月来到长江边的涪陵市，作为一名志愿者在师范专科学校教书两年。之前他对这个地方闻所未闻，他眼里看到的也是以前从未看到的、甚至想象不到的景象。“那座城市一直都在变化——在那些日子里，全中国上下都在快速发展着。”他用自己的笔记下这里的过去和正在发生的变化，于是有了这本《江城》。

跟着他看看这个城市吧：到处是空洞的标语口号；城里空气污染，烟尘滚滚，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直接排入江河；出租车司机在15分钟的行程中摁了566次喇叭；江湖郎中在街边用锈迹斑斑的器具为人拔牙；无休止的宴请中总有人烂醉如泥，学校和每个系都有酒量排行榜……

涪陵的另一面是别样的景色：“山谷里，春意无处不在——泡桐花竞相开放，黄灿灿的油菜花迎风飞舞，一畦畦萝卜、莴笋、洋葱、扁豆正在疯长……水稻的嫩秧一片碧绿，色彩艳丽。”更让海斯勒喜爱的是这座城市的人淳朴、真诚、坚韧，身上有一种无言的力量，他们对教育无限尊重，大多数人对于未来充满了乐观，对外国人也真心相待。

海斯勒教他那些农村来的学生读莎士比亚、狄更斯……也引领这些从长辈的苦难和贫穷的家乡走出来的孩子们认识外面的世界。他既把涪陵当作自己热爱的故乡，喜爱这里的一草一木，甚至容忍他的缺点；同时不忘自己的身份——一个冷静的外来者。“在这里，我有时是一个旁观者，有时又置身于当地的生活之中，这种亲密结合的观察构成了我在四川停留两年的部分生活。”海斯勒的朋友中有教师、学生、农民、神甫、生意人、艺术家，“涪陵

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我无法预测，这座城市还将经历怎样的巨变，但我知道，它永远是我的中国‘老家’。”

《江城》（River Town: two years on the yangtze）英文本出版于10年前，一直在美国畅销，2012年2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中文本，几个月内5次印刷，印数达13万册，这在近年历史文化图书中是罕见的。

离开在涪陵的教书岗位后，海斯勒当过《纽约客》驻北京记者，当过美国《国家地理》等媒体的撰稿人，现在是专职作家，2011年出版中文本的《寻路中国》（Country Driving）已使他名声大振。近十余年间，海斯勒常常回到涪陵这个第二故乡，曾经的贫穷、烂路、慢船，渐渐起了变化，长江上的快船多了，涪陵有高速公路，人们也正在摆脱贫困，往日美景却一去不复返了，甚至半个涪陵老城也淹没在三峡水库中。海斯勒说，《江城》“并不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它只涉及一小段特定时期的某个小地方。从地理和历史上看，涪陵位于江河中游，所以人们有时很难看清地如何而来，又去往何处。”而这个小小地方何尝不是当今变化中的中国的缩影，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我们想住进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又想留下白墙黑瓦的旧居；想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奔驰，又留恋乡间小道上的漫步。变化中的中国时时都在面对两难，也很难看清楚去往何处，只能存住对往日的记忆和缕缕乡愁。如海斯勒所说：“能再次回到长江上的感觉真好，哪怕它的旧时激流只存于我的记忆之中。”



袁晔